

太湖流域早期的青铜文化交流

——以苏州地区周代青铜兵器为例

李 岩

(浙江丽水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 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 地处中国周代王朝边远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 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青铜文明, 其面貌特征具有两重性, 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 又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文化色彩。苏州地区出土青铜兵器内涵丰富, 兵器类型、冶铸技术与剑体加工等方面独树一帜, 并给予周边地区以深刻影响, 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关键词: 太湖流域; 苏州; 青铜器;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0) 08-0122-06

太湖流域当时是古吴国的领地。史载商代末年, 西周先祖古公亶父之长、次子太伯与仲雍奔荆蛮到达江南, “文身断发”, 入乡随俗, 与土著荆蛮族人民相结合, 创建起“勾吴”国家即吴国, 周武王克商后, 因而封之, 都城在姑苏, 即当今的江苏苏州。太湖地区是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考古学资料亦可证实是为信史, 吴是周人和当地民族结合而形成的诸侯国, 如体现在江南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上, 其面貌特征具有两重性, 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 又表现出显著的地方文化色彩。

一、太湖流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内涵

长江下游的青铜文化比之中原确是起步稍晚。大概在湖熟文化(宁镇地区)、马桥文化(太湖流域)时进入青铜时代, 但出土青铜器数量极少, 夏商时期江南青铜文化仍处于萌发阶段,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则已数量可观, 且覆盖面广, 这是江南青铜器趋于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时期, 学者认为江南周代青铜器是当地青铜文化的主体。^①

目前为止, 在太湖流域共发掘春秋战国时期遗址、遗迹数百处, 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纹饰之精美, 比较少见。这一地区出土的铜器群主要有苏州虎丘、吴县何山等铜器墓, 还有一些窖藏等, 青铜器出土数量极多、技术特征较高, 时间段主要是春秋末期。肖梦龙先生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按形制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本地特点的造型。鼎中如虎丘等墓都出土有竖耳、浅腹、高蹄足外撇鼎。另外, 常见一种带盖鼎, 其形制特点是深腹、圆底、附耳、蹄形细高足外撇; 盖面微凸, 中有桥纽套提环, 周围三个竖环纽, 吴国铸铭铜器“吴王孙无壬”作鼎, 亦即为这种形制。其他器类如腰间带水注的铜甗, 圆鼓腹底部带三短蹄足缶, 平附耳三足大铜盘, 薄胎刻纹盘、匜, 以及乐器类成套的句和三件一组的罍于等器, 皆为其他地区所无的吴国特点的青铜器。

作者简介: 李岩, 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先秦史、文化史。

^① 刘建国 《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 《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二是与中原系统同类器物具有共同特点或相似，可以铸铭吴器吴王光鉴等器为代表，其形制和装饰都是较为典型的中原风格。

三是楚文化特点器。由于战争原因吴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在江南这一时期的铜器群墓中，常见吴器与一些楚风格的铜器共存，如圆圈形提手的附耳盖鼎，为当时楚鼎的典型模式。这其中有的楚式器可能是战利虏获品或馈赠品，如吴县何山墓铜盃，就有铭“楚叔之孙途为之盃”，表明其为楚器。

在纹饰上，这一时期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纹样是细密双线S纹，再就是薄胎铜器上的刻纹图像。其他同列国基本趋向一致，主要通行构图繁密华丽的蟠璃纹以及螺旋纹、羽状纹等。^①

二、苏州青铜兵器的文化特点

为了叙述清楚，从中我们择取太湖流域苏州地区青铜器中数量较多并且具有典型特征和代表性的青铜兵器来着重论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各方争夺的焦点，也曾经是吴越争霸的主战场，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青铜兵器也最多。主要器形有剑、矛、镞、戈、刀等，其中尤以戈、剑最为著名。

吴越地区是我国较早冶铸宝剑的地区之一，《新序·杂事篇》云“夫剑产干越”，高诱注“干，吴也。”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先生也曾根据文献著文论证我国铜剑起源于吴越地区，^② 现今不断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亦可完全证实这一点。

根据郑小炉的统计，^③ 1949年以来，苏州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以及与之伴出的器物主要有：

1958年，在吴县浪荡川圩出土8件铜戈，形制一致，年代为西周晚期。

1975年在苏州葑门河道内城河程桥下发现一批铜器，有铜剑2、镞2、鏃1、斧2、锤5、铎2、镰4，年代当属春秋战国。

1974—1975年在吴县洞庭西山消夏湾出土有铜剑和铜矛各一件，剑有漆木剑鞘，另有石器如石斧、有段石镞、石镞、三角形石刀、石犁等，年代当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1977年在苏州城东北一土坑中发现一批铜器，其中有铜鼎2、杯（舟）1、剑2、矛7、镞8、削3、钻1、带钩1、镰6、耨1、锤17、斤6，年代约当春秋战国之际。

1980年在吴县枫桥公社何山发现一批青铜器和陶器，后来调查征集一批文物，有铜鼎5、盃1、缶1、盘1、簠2、匜1、戈3、矛3、镞14、耨、辖两套。估计为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

1980年在吴县苏城北部的漕湖出土1件铜剑，年代当为春秋后期。

1986年在苏州市城东相门内仓街发现有铜鼎、壘、甗、鉴、三足盘、剑、器盖等各1件，皆残，形制不清，纽钟3件，年代约当春秋晚期。

1987年，在吴县越溪发现有铜剑1、削1、凿1、镰1、耨1，年代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

1988年在苏州长桥新塘M3发现有铜剑1、镞2、弭1，伴出的有印纹灰陶罐1、灰陶盖（盘）1，发掘者认为是越灭吴后越统治时期的墓葬，即战国早期。叶玉奇在《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④一文中，公布了以下几件青铜剑：

（1）1972年征集，出于吴县太湖乡白浮山水域的铜剑1件，宽格无箍，长41.2厘米，剑身最宽处4.5厘米，年代约当两周之际。

（2）1980年征集，出于吴县石公乡消夏湾水域的铜剑1件，窄格无箍，有扉棱，长39.5厘米，剑身最宽4.3厘米，年代约当两周之际。

① 转引自肖梦龙《吴国青铜器的发展、特色、成就》，《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③ 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④ 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剑》，《考古》1986年第4期。

(3) 1979年征集,发现于吴县郭港乡新开河的铜剑1件,窄格无箍,长41厘米,剑身最宽3.9厘米,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当不晚于春秋后期。从其剑身形制来看,与新开河剑相似,年代当相去不远。

(4) 1981年征集,出于太湖乡白浮山水域的铜剑1件,无格无箍,有新月形扉棱,长51.5厘米,剑身最宽3.5厘米,剑身有一兽面纹,作者认为其年代当不晚于春秋后期。但从其形状来看,细长无格,与战国楚国的铜剑形制一致,年代当在战国时期。

(5) 1972—1980年征集6件铜剑,其中5件出于太湖乡水域,1件出于浒关镇华山大队土墩墓,宽格双箍。其一长57.2厘米,剑身最宽5厘米,其二残长41.2厘米,剑身最宽3.8厘米,年代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

(6) 1978年征集3件铜剑,1件残,仅剩前半段,2件完整,出于横泾乡东太湖水域,剑茎柱状半空,无箍,窄格,其一全长57.4厘米,剑身最宽4.8厘米,其二全长45.7厘米,剑身最宽4.5厘米,年代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

从上可以看出,苏州地区出土的周代器物中,都有青铜兵器,可见这里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兵器的发达。究其原因,这里自古以来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太湖地区人们物质文化创造提供了理想的舞台。而且这里自古以来就为铜锡的著名产地,据《禹贡》记载“厥贡唯金三品(金、银、铜”。《周礼·考工记》亦曰“吴、粤之金锡,此材者之美者也。”在江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墩墓中屡有成坛的青铜块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武器类型上,虽然勾兵铜戈是太湖流域出土青铜兵器的大宗之一,但是宝剑却是这里出土器物最多的兵器,而且在太湖流域以外出土的吴国兵器中,宝剑更是最为常见,这是因为宝剑是东周时期作战最为常用的兵器之一,特别是吴越等江南水乡地区,军队以步兵为主,宝剑非常实用也更容易发挥威力。

春秋时期开始,太湖流域青铜冶铸业也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特别是宝剑的铸造更是一绝。战国时期的庄子赞美这一地区的宝剑“夫有干越之剑者”是“宝之至也”(《庄子·刻意篇》)。《周礼·考工记》认为只有吴越才能造出相当精良的宝剑,“吴越之剑,迂乎其地弗能良也,地气然也”,还与这里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吴地生产的宝剑不仅当时就声名远扬,而且直至今日,时隔2000多年出土后仍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例如众所周知的吴王阖闾的宝剑。

有学者根据铜器的组合、形制和纹饰的不同,并将受中原影响与自身发展所表现的在文化内涵上不同,将上述青铜兵器所代表的太湖流域青铜器划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土著型三种类型,中原型就是早期受中原王朝影响而铸造的兵器,例如,吴县何山墓原I式戈,短胡单穿戈,尖首,内较长,属于春秋晚期,数量很少,属于典型的中原型青铜兵器。吴人在对外来文化的吸取与借鉴上,也并非“邯郸学步”,而是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矿产资源条件,并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长,从铜质的熔炼到器物造型及花纹装饰等工艺方面,均体现出生动活泼、富于革新的精神,这是吴国青铜器艺术发展史上值得赞道的地方。至春秋中、晚期,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已是后来居上,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

到了中期,随着吴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自身民族冶铸技术的提高,自身特色逐渐显现,出现了中原型与吴国本身型相融合的类型,到了吴国末期,吴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跃居列国前茅,尤其在铸造技术等方面地位领先,吴国铸造青铜兵器以剑、戈、矛为代表,无论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实物所证,质精物美,驰名列国,视之如宝。史载季札赠剑故事成为我国冶金史上流传百世的一段佳话。这一时期吴兵器的形制特点,戈和矛,器体瘦长、锋刃锐利。特别在有些精致兵器上所饰菱形、米字形及火焰状几何暗花纹,是它特有绝技,埋藏地下几千年不锈不腐。目前虽经对这种花纹铸法所作现代化技术检测,有说是采用复合金属工艺铸成,有说是经过硫化处理,仍为不解之谜。这是吴国青铜匠师们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剑体加工方面独树一帜,具有吴越地区一致的特点,如文字的字体上,整个吴越地区出土青铜铭文中很多为鸟篆体,而兵器上的鸟篆体尤多,笔者以为这或许是与吴越地区以鸟为图腾有关;剑体

错金铭文，关于铭文，虽然历来学者间有歧义，但全部注明为吴王、越王或王室所用之剑，当为不争的事实。

三、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早期青铜文化交流

春秋末期，吴国“益疆称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败越国，一度争霸中原，成为长江下游的一个强大国家。此期间吴国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技术水平，以其著称于世的铜兵器为标志高超于中原诸国。苏州虎丘、吴县何山等铜器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就是典型代表。这种高超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随着吴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列国，其中尤以青铜宝剑最为有名。

近年来，在古吴国以外的地区发现有很多吴国的青铜兵器，由于当时的交往、馈赠、嫁女、出亡以及战争诸原因，不少吴国铜兵器流传列国，近来就在各地发现了不少吴剑。吴地以外发现的吴地青铜兵器，应该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国青铜器对周围文化的影响所致，反映了周代太湖流域青铜对外文化交流强势所在。吴地以外发现的吴地青铜兵器主要有以下几件吴王的宝剑：

1959年，在淮南市八公山区蔡家岗赵家孤堆 M2 出土“工敷大子姑发反剑”1柄，剑脊隆起呈三菱形，一面有两行铭文共35字。至于此工敷大子姑发反，郭沫若和董楚平先生认为是寿梦之子诸樊^①，陈梦家先生则认为是夫差之子太子友^②，我们认为释为诸樊更为合理。

1983年在山东沂水县诸葛北坪子一座墓葬中出土1件工王剑，剑身两侧有铭文共14字，为“工王乍元巳用义江之台北南西行”。董楚平认为此工王即吴王诸樊^③。

1985年在山西榆社三角坪发现1件“工季子剑”，剑身上有铭文两行24字，原报告称为“吴王发剑”，但从铭文的大意来看，当为吴王诸樊之弟季子之剑^④。另有其他的一些考释文章认为是吴季子之剑^⑤。

1982年在湖北襄樊襄北农场新生砖瓦厂发现1件攻王姑发之子曹剑，剑身铭文2行17字。姑发当为吴王诸樊^⑥。

1961年在山西万荣后土庙贾家崖出土2件王子于戈，每戈各铭7个错金鸟篆文，一面为“王子于之用戈”，另一面为“杨”。王子于，多认为即吴王僚（前526年以前）^⑦。董楚平独认为是为吴王夫差^⑧。

1964年在山西原平峙峪赵家塙出土1件吴王光剑，剑身上铸铭文两行8字，为“攻敌王光自乍用剑”，吴王光即吴王阖廬（前514—前496年在位）。1974年在安徽省庐江县汤池边岗出土1件吴王光剑，剑身中起脊，上有铭文两行16字。对该铭文的释读，后8字多有分歧，何琳仪释读为“攻敌王光自乍用剑余允至克多攻。”^⑨

^① 郭沫若《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4期；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陈梦家《蔡器三题》，《考古》1963年第7期。

^③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发现工王青铜剑》，《文物》1983年第12期；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晋华《山西榆社出土一件吴王发剑》，《文物》1990年第2期。

^⑤ 如曹锦炎《吴季子剑铭文考释》，《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⑥ 朱俊英等《攻王姑发之子曹剑铭文简介》，《文物》1998年第6期。

^⑦ 张颌《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物》1962年第4、5期；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吴越青铜器及其研究》，载《吴越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⑧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⑨ 马道阔《安徽庐江发现吴王光剑》，《文物》1986年第2期；何琳仪《皖出二兵跋》，《文物研究》第3期，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

1978年在安徽南陵县三里公社与河湾公社的交界处发现1件“攻敌王光剑”，剑身有两行铭文共12字。

1959年，在淮南市八公山区蔡家岗赵家孤堆M2出有“工敌王夫差戈”1件，内残破，共有10个铭文。陈梦家释为“□□王□□（自作）其用戈”，孙稚雉则释为“工敌王夫差自乍其用戈”。^①

1980年在安徽霍山县南岳上元街十八塔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出土1件“攻敌王差戟”，出土时不见矛，援两侧各有四个错金铭文，对其释读尚有很大分歧，简报认为是“攻敌王差戟”^②，殷滌非认为是“攻敌工年戟”，即季札戟^③。陈秉新则称之为“攻敌工叙戟”，认为“工叙”即吴公子盖余，为寿梦之子。^④董楚平同意陈秉新的释读，但认为“工叙”为句余，即余祭。^⑤

1983年在湖北江陵马山砖瓦厂M5出土1件吴王夫差矛，矛身有错金铭文8字“吴王夫差自乍甬铤。”

1935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出土1件“攻敌王夫差剑”，剑身铭文10字“攻敌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1991年在河南洛阳市东周王城内的M3352出土1件吴王夫差铜剑（M3352:1），剑身铭文仅见7字“敌王夫差其元用”，董楚平认为其原铭当为“攻敌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M12出土1件吴王夫差剑，剑身有铭文2行10字“攻敌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1976年在河南辉县废品站收购1件吴王夫差剑，据调查于1949年前在辉县琉璃阁附近出土，剑身有铭文10字“攻吴王夫差自乍其元用。”1991年在山东鄄县城关镇朱山庄村西北发现1件吴王夫差剑、剑身有铭文两行10字，为“攻敌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通过本地区墓葬出土的一些成组兵器和本地区以外的吴地出土青铜兵器来看，到了春秋末期，也就是吴国末期的时候，吴兵器的特点有二：一是兵器类型增多，其基本组合形式为戈、矛、戟、剑、傲。长短兵器及步车兵器配套齐全，进行远射、格斗和护体三方面功能的武器俱全。二是每一种兵器形式丰富，类型多样，制作精美，器身亦见施有火焰纹、菱形纹等暗花，戈的援部多设弃饰一戈戟和二戈戟以及车马饰、盖弓帽的普遍出现，说明吴国在对兵器铸造形式上，除坚持自己的传统体制外，能够广取列国之长。如戈就有短胡一穿、长胡二穿、三穿、四穿之分。其中狭长援，援穿上带鼻饰者，据安徽寿县八万山蔡侯墓所出带铭文的戈分析，明确为吴、越特点。各式铜矛中，卖口端呈两圆弧尖形的，显系前两期吴式矛的演化。戟从六合程桥一号墓出土一件带柄完整器，全长2.27米，与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楚国车战戟是一致的。剑的形制以六合程桥一号墓I式剑为代表，锋呈弧形尖状，刃微外弧，剑身隆脊有棱，格上刻缕镶嵌纹饰，茎作圆柱或扁圆柱形，圆盘形首。精致名贵剑身往往满布花纹，常见有几何形纹及火焰状纹，如山西峙峪出的吴王光剑，河南琉璃阁出的吴王夫差剑以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均属此式剑，是吴国晚期的典型剑制。此期铤的形制分双翼圆釜式、三棱式及圆锥式三种。^⑥可见，太湖流域青铜文化在吴国晚期对中原和楚国的影响之大。

春秋早期到晚期时期，随着吴国其国力由自强到争霸阶段的不断增强，其势力范围也相应地由太湖流域向西部拓展，太湖流域特色青铜文化也就相应地流向西部的广大地区。除了青铜兵器之外，还有所有青铜器的文化交流。春秋末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地区青铜器也影响到广东中部与广西东

①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陈梦家《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7期；孙稚雉《淮南蔡器释文的商榷》，《考古》1965年第9期。

② 王步毅《安徽霍山县出土吴蔡兵器和车马器》，《文物》1986年第3期。

③ 殷滌非《吴工年戟跋》，《文物》1986年第3期。

④ 陈秉新《安徽霍山县出土吴工叙戟考》，《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

⑤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⑥ 肖梦龙《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

北部地区之间。在春秋晚期之前，这一地区至今未见有明显的吴越地区青铜文化因素。春秋晚期以后，吴越文化因素开始大量涌现。其中主要的有立耳深鼓腹（或略垂）越式鼎、牺尊、三足鉴、提梁带两扉棱铜盃、圆首柱茎（实心或空心）有格长剑、扁长方体单肩或双肩钺、阴线界格三角雷纹和S型夔纹越族甬钟、锺、镰、镇等铜器明显是来自于吴越地区的，说明吴越地区对广东和广西东北部的铜器都有较大的影响。

结 论

太湖流域地处我国长江下游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走廊上，因此它对于沟通中原商周文化与南方文化，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其地青铜器既有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但更突出表现出许多发明创造，包括在器种、形制、纹饰、青铜合金成分等方面。在发展序列上有其自身演化规律，一脉相承，能够自成体系和有着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时期都显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有她多方面独到之处，终于达到列国领先水平，特别是青铜兵器，不但在太湖流域，而在整个吴越地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周代铜剑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先导作用，是伟大中华民族光辉灿烂青铜文化艺术宝库中的悦目奇葩。历史上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先后属于吴国、越国和楚国，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本地的青铜文化能够继续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形成自身特色而保持不变，并且给周边列国以强烈影响，这是本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兼容并包和人们不断开拓创新的结果。

总之，黄河、长江都是孕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摇篮。我国古代文明的早期，处于中国周代王朝边远地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青铜文明，对创造中华古代文明作出过增辉添彩的不朽贡献。

责任编辑：尚永琪